



天安门 前看升旗

刘明礼



去年国庆节前十来天,两个外孙就嚷嚷着要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小哥俩一个上小学三年级,一个上一年级。他们在课本里学过《我爱北京天安门》,在电视上见过国旗护卫队正步走进天安门广场,心心念念要亲眼看一次。我们住在四环以内,离长安街并不太远,天安门不知去过多少回,可专程看升旗还是头一遭。

现在天安门广场实行实名制参观,要提前通过“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服务平台”预约。我掐着日子,提前一周就把三个人的信息填好,选了升旗时段。预约成功那一刻,两个外孙在屋里欢呼起来。

国庆节前夜,我把闹钟定在凌晨3点。到时间了,赶紧去叫两个小家伙,平时要喊上好几遍才起床的哥俩,一骨碌就爬起来,下床,麻利地穿好衣服。我催着他们去洗脸,才忽然发现他们一人脸上贴了一面小小的国旗贴纸,是头天晚上他们自己贴上去的,睡觉都没舍得揭,脸干脆也不洗了。

3点半从志新村打车出门,北京的秋夜凉意已浓,出租车穿过还在沉睡的街道,路灯一盏盏往后掠过。两个孩子扒着车窗,时不时问一句:“到了吗?”车到前门附近就过不去了,我们下了车跟着人流往前走。越接近广场人越多,男女老少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有的还拖着拉杆箱,一看就是连夜赶来的。安检口前排队队长,工作人员逐一查验身份证件和预约信息。两个小外孙一会儿拉着我的手,一会儿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焦急地向前张望。

过了安检,只见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第二天的报纸上说,那天共有12.1万人从全国各地会聚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好不容易挤到一个勉强看得见旗杆的位置。两个孩子被前面的人挡着,急得抓耳挠腮,我只好拱手作揖,求着前面的人给孩子让个缝,好不容易才挤到了前排。

4点多的天安门广场,晨风带着凉意吹着,有人裹着毯子席地而坐,有人靠着栏杆打盹,更多的人仰着头,望向旗杆的方向,静静等待着。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两个孩子一开始还兴奋地东张西望,后来渐渐安静下来,靠在我的肩膀上打起了瞌睡。我接着他们,望着天安门城楼上的灯光,想起自己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在乡村小学的操场上第一次升国旗,那面国旗是老师用竹竿挑起来的,旗面已经洗得发白。谁能想到,几十年后,我能牵着自己的外孙,在天安门广场上等待那面最特别的五星红旗升起。

天色渐渐透出光亮来。6时2分,军乐团在旗杆周边就位。6时6分,天安门城楼上的战士吹响了升旗号角。原本困倦的人们瞬间精神起来,手机、相机齐刷刷举起来。两个孩子也精神起来,神情专注地站在我身前。6时7分,晨光熹微,天安门城楼巨大的拱形门洞下,96名国旗护卫队战士组成的护旗方阵,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了出来。从金水桥到国旗杆下,103.5米,正步138步。两个孩子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那一片橄榄绿由远及近。6时11分,洪亮的口令划破清晨的宁静:“向——国旗——敬礼!”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擎旗人手中“唰”的一下被展开,迎着晨风冉冉升起。人们齐声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声音汇成声浪,漫过广场,在空中久久回荡。

我看到,两个外孙胸脯挺得笔直,小手举得端端正正,行着少先队员队礼,注视着那面渐渐升高的五星红旗。国歌奏完,五星红旗刚好升到旗杆顶。上万只和平鸽腾空而起,在广场上空盘旋。《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来,两个孩子和参观升旗的人们也跟着一起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升旗仪式不过短短几分钟。可这几分钟里,我心头热了又热。看着两个外孙仰着小脸向国旗敬礼的样子,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在他们心里生根。就像当年,我的老师把那面洗得发白的国旗插在乡村小学的操场上一样。

从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上《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个音符,到街头巷尾人们哼唱的《我和我的祖国》,再到校园传出的音调各异,但却都雄浑奋进的歌曲,十月,天生属于歌唱。于我,十月的旋律更有着特别的韵味,它藏在天津大学附近录音棚里反复打磨的校歌中,落在天津音乐学院十一经路校园里清唱的生日歌里,也回荡在蓟州环线内外村镇孩子们稚嫩的笑声声中。那是时光的刻度,也是岁月的和声。母校华诞与共和国生日重叠在金秋,属于我的十月旋律,在心底谱成了一部绵长的随想曲。

■ 天大东门对面的录音棚

入秋,卫津路两旁的杨树开始落叶。2005年10月2日,天津大学110周年校庆。国旗、彩旗、返校的老校友,校园的空气都充满兴奋的味道。

那年,我担任天津大学学生社团北洋合唱团团长,校庆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除了文艺晚会登台表演,“进棚”录制校歌也是重中之重。

卫津路一侧是天大东门,另一侧的电台大院里有一个16号录音棚。走进16号棚,隔音棉完全阻隔了室外的喧嚣。我们几十个人挤在里面,戴着耳机,盯着谱合,一句一句地抠校歌的词句。指挥不需要在台上挥棒,而是坐在调音台前,像个严苛的匠人:“‘花堤蓁蓁’的‘蓁’字,气息再沉一点。”

天津大学校歌诞生于1935年,由廖辅叔作词、萧友梅作曲,为纪念北洋大学建校40周年而作。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年代,“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不是浪漫的抒情,而是一代学人救亡图存的呐喊。如果不能紧密联系校歌的创作背景和时代环境,我们很难唱出旋律里的铿锵。抗战时期,学校迁往西安、汉中,师生们即便在茅草棚里上课,依然能满怀激情地演唱校歌。

正式录制那天,我们从白天一直唱到深夜。每一句歌词都要录好几遍,直到指挥满意地比出“OK”的手势。当最后一句“念过去之艰难缔造,愿一心一德共扬校誉于无穷”录毕,我摘下耳机,耳朵里嗡嗡作响,但心里却异常路实。我知道,我们录下的不只是音符,更是一所闻名于世的高等学府跨越百年的心跳。

校庆晚会那晚,当这版录制好的校歌作为第一章“爱晚晴·追忆”的主题音乐响起,110名合唱团成员站在台上领唱,全场师生、校友齐声跟唱。我站在台上,四面八方涌来的歌声,汇成一股洪流。音乐最动人的力量,不在于技巧的完美,而在于它能让无数个“我”,变成同一个“我们”。

我的十月随想曲开篇庄重、深沉,带着历史的回响。

■ 天音女生红烛旁的清唱

三年后,我站在了另一所母校的庆典现场。2008年10月15日,天津音乐学院50周年校庆。河东区十一经路57号,这座被海河润泽的校园,到处是鲜花和笑脸。那天上午的庆祝大会上,50名女生手捧红烛,从会场两侧缓缓走出,清唱《祝你生日快乐》。

十月随想曲

周名赫



是为新中国庆祝生日,也是对母校的深情祝福。烛光摇曳,歌声纯净,许多老教授悄悄抹去眼角的泪光。

1958年10月,中央音乐学院迁京后,天津音乐学院建立,随后正式定址于河东区十一经路57号。50年的耕耘,这所学校为中国音乐事业输送了大批音乐艺术人才。校庆当天,校友施光南、王莘两位先生的塑像揭幕。

师生合唱的节目,是陈晓光作词、施光南作曲的名作《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坐在观众席,望着台上年轻的大学生一张张青春的面孔,想起三年前录制天津大学校歌的自己。从“花堤蓁蓁”到“希望的田野”,从卫津路的理工科课堂到十一经路的艺术学府,我的人生轨迹因为音乐发生了改变。也是在那次天大校庆后不久,我下定决心跨专业报考音乐学硕士,去深入研究那些旋律背后的时代精神。

在天津音乐学院的几年,我泡在图书馆里,翻看研究老一辈音乐家的作品、手稿,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音乐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时代的回声,是民族的记忆。

那50根红烛的光和女声清唱版的生日歌,是我的十月随想曲中,一段温柔而明亮的华彩。

■ 蓟州青少年的悠扬琴声

在天津音乐学院工作多年后,我受组织委派任渔阳镇小刀剪营村第一书记。2024年10月,国庆假期结束后,我开始常驻蓟州。

第一个清晨,叫醒我的是室外大喇叭播放的女声独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就是16年前天津音乐学院校庆时师生合唱的那首歌曲。秋高气爽,歌声随着带有泥土味道的清风飘进村镇百姓家。

两年的基层工作,我把两所母校的音乐基因带进了蓟州。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音乐是最柔软也最有力的纽带。我通过与镇领导商议,工作之余投身创作镇歌《渔阳的歌儿唱起来》。我随手记录下有感而发的音符,与当地的文化能人一起,把乡村振兴的新风貌写进歌词:“渔阳是我们美丽的家园,红火的生活五彩斑斓……新时代‘三农’工作快速发展,乡村振兴开创新局面。”文旅活动“伏羲宴”那天,孩子们用清亮的嗓音唱着渔阳镇自己的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格外动人。

接着,“20架钢琴进蓟州”项目启动,一架架专业演奏钢琴送进学校和乡村。当第一架钢琴运到时,孩

津派文化大家谈

除了天津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典藏之外,在津的一些高校也收藏有甲骨。现在所知者,主要有两家高校博物馆,一家是天津师范大学博物馆,一家是南开大学博物馆。

■ 天津师范大学博物馆馆藏甲骨

1958年天津师范学院(今天津师范大学前身)正式建校,文博类标本稀缺,该校历史系为满足文物考古、先秦史教学工作的需要,学校划拨专项经费,后来由历史系主任张貽宝副教授牵头组建征集小组,在京津地区的文物市场上系统性收购文物,甲骨就是其中一类教学标本。1960年前后由天津师范学院统一购入甲骨片,入藏天津师范学院图书馆,后归历史系文物室管理,长期作为教学标本存放。2025年9月,天津师范大学博物馆正式落成,原图书馆文物室全部文物(含殷墟甲骨)统一划拨给博物馆,设立常设文物展陈专柜,对外公开展示。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殷墟甲骨,已经在上世纪70年代由曾在天津艺术博物馆工作(后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李先登先生作了整理、鉴定、统计、拓本制作、分期断代、内容分类和文字考释,完整记录了这批甲骨藏品入藏背景、来源、尺寸、文字特征,以标准馆藏器物考古简报格式写成了《天津师范学院图书馆藏甲骨选介》,发表在《天津师院学报》1978年第4期。

经李先登鉴定,这批甲骨文属于董作宾五期分法的第一期(商王武丁及其以前时代)甲骨19片,包括龟甲12片,牛骨7片;属于第二期(商王祖庚、祖甲时代)甲骨2片,龟甲和牛骨各一片;属于第三期(商王廪辛、康丁时代)甲骨2片,龟甲和牛骨各一片;未见比较晚的第四期(商王武乙、文丁时代)和第五期(商王帝乙、帝辛时代)甲骨。晚商甲骨真品23片,还有伪刻1片。

这批甲骨,是天津高校为数不多独立保存的殷墟甲骨,但因为都是较小的碎片,在内容和文字上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因此未见于各种甲骨文材料著录书,也未被收入《甲骨文合集》等大型甲骨著录工具书。不过正因为这批材料未见著录,所以它在甲骨文研究基础方面为甲骨缀合和文字考释以及商代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仍具有多种学术价值。

■ 南开大学博物馆馆藏甲骨

南开大学博物馆,是在原文博专业成立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原历史系扩展为历史学院之后开始筹建的,2014年正式建成使用。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文博专业筹建负责人、著名先秦史家王玉哲教授等人,为了充实古代历史教学标本和教具,已经开始了文物收藏。这些从京津地区文物市场购买及文博单位支援的多项文物中,有11片殷墟甲骨,其中就有王襄先生捐赠的一片旧藏卜骨。

这批甲骨长期由历史系文物标本室保管,南开大学博物馆正式建成后统一入馆藏藏,是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博物馆专业、古文字教学科研的核心实物标本。

这批11片甲骨均为牛肩胛骨残片,

■ 金秋十月的开放性乐章

又是一年十月。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津大学迎来131周年校庆,天津音乐学院迎来68周年校庆。此刻,我已经结束驻村帮扶工作,回到熟悉的校园。我想,无论身在何处,我的十月,始终与两所母校、与新中国的生日同频共振。

从卫津路录音棚里反复打磨的校歌,到十一经路红烛旁的句句清唱,再到蓟州田间地头飘出的镇歌,这些过往,恰好叠合在“十月”。音乐于我,不只是单纯的学科学业或职业专长,还是连接“兴学强国”与“乡村振兴”的一座桥。

《北洋大学校歌》曾激励着战火中的学子,《在希望的田野上》满怀对幸福生活的赞美,我把深入乡村一线采风挖掘而来的自然之美、人文之厚与奋斗故事播撒在了蓟州温润的泥土里。当镇歌、琴声响起,当孩子们用稚嫩的嗓音唱出对祖国的爱,我知道是音乐,让根扎得更深、让心贴得更近。

我的十月随想,在思绪中交错奏响。其实,真正的“十月随想曲”作者并不是我,而是永不落幕的时代。

无完整龟甲,且片形普遍偏小、残碎,卜辞简短,但有些内容比较重要,被甲骨文著录书籍收录。比如那片著名的王襄旧藏卜骨,被《甲骨文合集》收录。《光明日报》2025年8月12日13版,“高校博物馆拾珍”专栏刊登了《南开大学博物馆:甲骨》一文,专门介绍的就是这版甲骨。这件商代卜骨,长7.6厘米、宽3.3厘米。骨的正面清晰镌刻有“一月唯王十祀又九”的文字,属于商王纪年比较明确的一版刻辞,是记录商王祭祀与纪年的珍贵原始材料,具有重要的年代学意义。前些年,在学术界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这片甲骨刻辞

天津高校 与民间甲骨收藏

甲骨文与天津(五)

朱彦民



也参与其中,提供了与年代学相关的重要参考信息。

■ 天津民间收藏殷墟甲骨

天津作为近代北方甲骨流通的核心集散地,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大量殷墟残骨在此流通,天津博物馆、南开大学博物馆、天津师范大学博物馆所藏甲骨,以及新学书院、北疆博物馆等所藏甲骨,均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入藏文物的典型代表。

天津的民间甲骨收藏,也颇具规模,甚至还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早年津门政、商、学三界士人多有藏甲骨者。除了著名的甲骨藏家王襄、孟广慧、罗振玉、陈邦怀、王懿荣之子王崇烈、王懿荣的孙女王福重等人之外,还有收藏家如方若、方尔谦、王西铭、杨富村、李鹤年、杨鲁安、周叔弼、张书诚、徐宝祠、魏晋、徐宗元、谢午生等。他们收藏的甲骨有的后来捐献给文博单位,有的作为传家宝流传后人,秘不示人,还有一些不具名的甲骨收藏家,失考者更不知凡几。“文革”中红卫兵查抄李鹤年家藏,掠走了之前李先生捐赠给文化部400片剩余的30片,后来落实政策归还了李家20片,另外10片下落不明。现在还有私人所藏甲骨偶尔浮出水面,供人品鉴。我曾两次参加在津甲骨文书法展,每次都有朋友的私家藏品甲骨实物助展。由此可知,社会上私人收藏甲骨者,不在少数。

总之,在津的学术界名流、书法家、商人、私人收藏家等,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甲骨收藏系统,无怪乎天津历来被称为甲骨重镇。

题图为南开大学博物馆所藏甲骨照片。

★90 长征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长征的伟大事迹逐渐为人所知。

1936年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有文章这样写道:“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以后,它才有价值。”该报的评论肯定了红军所创造的人类奇迹,但也暗含偏见,以为红军“粗陋无文”。

这一年夏天,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毛泽东觉得这是对外宣传红军并争取国际援助的好机会,于是和杨尚昆联名,在陕北发起长征亲历者集体写长征的征稿活动:“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总总政治部……”响应此号召,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许多干部战士纷纷拿起笔投入写作。到1936年10月底,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际,由丁玲参与编选的编委会已收到200多篇、50余万字的稿件。经过认真编辑,1937年2月终于编成一本《二万五千里》,收入100多篇、30多万字,以马兰纸誊清几部,由朱德题写书名,但未公开印刷。这部作品直至1942年11月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内部印刷,书名改为《红军长征记》,1955年人民出版社公开版本又增删了一些文章,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最真实、最具文化特色的纪实性作品。在它内部印刷60年之后的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了朱德签名、斯诺收藏的稀见本。2006年,在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按1942年版原稿本系统整理重出,而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影印了上海鲁迅纪念馆馆藏的《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这成为当时纪念长征的一件盛事。

这部书的作者,可谓名将云集,彭雪枫、张爱萍、刘亚楼、杨成武、耿飚、谭政等,因为那时候他们正在陕北保安抗日红军大学一期学习,故而能有一定的写作时间。彭雪枫拿出的文章题为《娄山关前后》。彭雪枫是南开校友,他儒将的底色始于天津。1921年,时年14岁、原名彭修道的他从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来到天津投奔伯父彭延庆,在南开中学一年级四组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如今,南开中学西斋平房设立了周恩来、马骏和彭雪枫等杰出校友的纪念室,彭雪枫的军装照陈列其中。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南开敬业乐群的校风,允公允能的校训,感染塑造了他。1926年9月,他在北平汇文中学就读时,在那里入党并任校支部书记,后在北平东城进行学生运动。1928年,他受党的派遣,秘密赴天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彭雪枫和天津的缘分还在继续。1927年春李大钊遇害,北平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彭雪枫重返天津,与北方党组织保持联系,继续做党的

秘密工作。转年年初,彭雪枫报考天津《大公报》校对一职落选,但他在3月以“修道”的本名在《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上发表了杂文《又是在电车上》,并在同月于《国闻周报》上连载《塞上琐记》,这组长达两万余字的文章,记录了京绥铁路沿线的塞外风光与忧国忧民之情。

1929年6月,彭雪枫受党派遣,进入山东军阀刘珍年部进行兵运工作,当年10月,他将这段时间的经历与见闻写成《烟台纪行》,发表在天津的《国闻周报》副刊上。天津是他求学启智之地,也成就了他的一段卖文生涯。

1930年2月,彭雪枫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随后以中央军委巡视员的身份到江苏镇江一带巡视,5月,他被派往苏区,成为红军一员,他参加过多次战役,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这段时间里,他在红军多个部门任职,担任政委,一路行军打仗,文武兼修。

1933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在江西浒湾外围,红七军团受困,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的彭雪枫带兵前去增援。敌人先是退守八角亭,之后反扑,彭雪枫率通信排反冲锋,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被送往瑞金医院。1934年春,他伤愈后进入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写下《八角亭战斗的教训》一文,总结战斗经验,反思贻误战机的教训,显示出一个指挥员的责任与一位文人的自觉。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遵义会议之后,彭雪枫担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又经扎西缩编,成为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团长。1935年2月,他即率部参加娄山关方向作战。娄山关一战给他留下极为难忘的印象,促成他日后留下战地回忆散文《娄山关前后》。

这篇文章从二渡赤水写起,再写攻打娄山关,并写到他拿下遵义城的全过程,所以题为《娄山关前后》,但文章的主体部分还是攻打娄山关的过程。这篇文章在长征的相关文献里可以算是最富有文学色彩的篇章之一,它专门摹写一场战斗,读来如临其境,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地还原了战斗场面,也有红军战士的心理和思想活动,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指战员在战争中敢于斗争的意志品质和乐观主义的精神面貌。

娄山关是长征途中的一个重要关口,红军在此经历转折,紧接着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出奇制胜,是从突围求生转向机动开战的拐点。所以,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里才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的词句。毛泽东的这首词,也凝练地勾勒了娄山关的战斗。请听“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请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都是那样悲壮而又热切。

吴起镇会师之后,彭雪枫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委,参加直罗镇战役。此后随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横渡黄河,到霍县、洪洞一带扩红筹款,1936年5月回师陕北,正逢中国工农抗日红军大学于6月1日在瓦窑堡开学,当月瓦窑堡遇到敌情,红大随中央机关撤出,7月校部进驻保安城南桥沟,8月里,彭雪枫写下《娄山关前后》。

《红军长征记》这部书具有史料和文学双重价值,其中陆定一的《老山界》、刘亚楼的《渡乌江》、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杨成武的《突破天险的腊子口》等都很值得一读。这些文章充分证明,红军非但不是粗陋无文,而且是一支文武双全的队伍。

题图一为1942年总政治部印刷的党内参考材料《红军长征记》书影。

题图二为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书影。

档案文献里的长征记忆(五)

南开学子的 长征纪行

杨仲达

